

中西价值观在汉英新词语中的映射

王晓凤,刘银燕,孙然颖

(浙江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摘要:一定的价值观孕育于一定的历史土壤之中,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折光反映和思想标记,它制约和影响语言。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价值观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品格,导致其在汉英新词语的表达中有差异。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探究中西价值观在近当代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科技及文化条件下的变化以及对汉英新词语的影响,以求增强人们对中西价值观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关键词:价值观;新词语;映射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4303(2015)01-0045-05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家陈原^[1]先生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在我国,新词语的研究主要以汉语新词语为主,集中对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构词特征和发展趋势、理据性等语言本体的研究,如《20世纪中期以来汉英新词语的来源及其语义认知机制》^[2]认为:汉英新词语的产生途径来自新外来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旧词语的新义新用和方言词语的吸收。孔筱燕、杨廷君^[3]对英汉网络新词语进行了探究,并且认为网络新词语的大量出现亦是汉英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还有些学者对汉英新词语理据性进行了研究,如《从英汉新词语看语言理据观》^[4],该文探讨了新词语产生的认知理据,认为很多新词语是转喻和隐喻两种认知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新词语的理据与词的性质和词的语义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认为汉英的理据性更强。王进^[5]认为词

汇的理据性应包括语音理据、语义理据、形态理据及文字理据。他详细地分析了英汉网络新词语的生成规则及形态理据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英汉两种语言构词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

新词语是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世界观和社会文化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其研究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以及语言与文化等多个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价值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国内外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Kluckhohn 和 Strodtbeck^[6]提出了人类价值观共同五大问题理论,Rokeach^[7]认为价值系统可分为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开始从维度而不仅仅是从内容上对价值观的分析和测量,使价值观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我国,本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语言学在该领域研究主要包括通过分析语言现象揭示价值观异同,苏文妙^[8]运用话语分析及语用学理论分析语料对比不同文化价值观之异同,张德明^[9]从文学视角对比探讨作品中折射的价值观等。

以上研究视域较宽阔,但对于汉英新词语的研究主要涉及词语本体特征的描述,对汉英新词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2013年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JCW08YB)

作者简介:王晓凤(1963-),女,湖南永州人,教授,博士,从事翻译、文学和跨文化比较研究;刘银燕(1975-),女,江苏连云港人,讲师,硕士,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孙然颖(1982-),女,河南辉县人,讲师,博士,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叙事学研究。

语的语义特征探究,特别是结合中西价值观差异对新词语的影响等宏观分析研究较缺乏。本文拟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在近当代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科技及文化条件下中西价值观对汉英新词语变化的影响。

二、新词语与价值观界说

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语言与文化同步发展和变化,它能充分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文化的表征。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民族文化语言形式折射后的焦点,它能够迅速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镜像。一定时期的新词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纽马克^[10]曾指出“Neologisms can be defined as newly coined lexical units or existing”(新词语可定义于新创造的词语或产生新义的旧词)。我国学者王铁昆^[11]通过归纳国内外有关新词语的界定后做了权威的定义:“新词语是指一个新创造的词或从其它语言,从本民族的方言词、古语词和行业词中所借用过来的词语,也指一个产生新词新义、新用法的固有词”。从上述学者们对新词语的论述可以看出,从字面意义上看,新词新语就是新近产生的新词语。狭义上的新词语就音和义都是新的词语,广义上的新词语既包括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的词,又包括新义的旧词,还包括语义未变却产生了新的语音形式的词。

新词语作为语言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融合体,来势迅猛,范围广泛,形成了近当代一种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和文化景观。相当数量彼此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新词语组成一个有机的词语群,如伴随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以“电脑”、“微机”为核心词,形成了一个以兼容性(compatibility)、内存(memory)、软件(software)、硬件(hardware)、光标(cursor)、重新启动(reboot)等数量颇大的词语群;为了描述某类事物或现象,通过一词语分别与他词语组合搭配而组成一个词语串, generation-gap 一词衍生而来的 culture gap(文化隔阂)、credibility gap(信誉沟)、communication gap(通信障碍)等频频见于各种传媒。新词语传播速度快、新陈代谢周期短,中央电视台一个3.15消费者晚会,使“打假”一词一夜之间迅速风行全国,被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另外,在英汉民族接触与交际过程

中,语言间借代或交换的频率日益提高,出现了 AIDS(艾滋病), asuna(桑拿浴), CT(计算机断层摄影仪), UFO(幽浮)等词语。

学术界对价值观的界定有许多说法。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使人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不同价值标准。研究者们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价值观的内涵:一些研究者把价值观看作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来探讨,一些研究者受特质论的影响,把个体价值观定义为一种特质,或将价值观定义为一种行为取向或认为价值观是一种抽象的目标或一种内驱力等。虽然关于价值观的概念众说纷纭,但是克拉克洪^[12](Clyde Kluckhohn)在1951年所提出的价值观定义却得到了比较多的赞同。他认为: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它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克拉克洪对价值观的定义规定了价值观的主体,指出了价值观的存在形式,强调了价值观的功能和作用,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本质上都吸收了这一经典定义的精髓。我国学者对价值观概念的理解也是多样的,杨国枢把价值观看作是一种偏好,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对特定行为、事物、状态或目标的一种持久性偏好,这种偏好在性质上是一套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成分的信念。黄希庭^[13]借鉴哲学上对价值观的界定,他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区分好坏、美丑、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情感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我们认为,价值观是一种观念或信仰,具有知、情、意三种不同层次的内容,是有关值得做的终极状态或行为方式,它是对事物进行评价与抉择的标准,是推动并指引人们决策和采取行动的核心要素。

语言与历史是同步发展、变化的,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和人们不同的价值观,都会在语言中得到映射。1964年,美国学者布赖特^[14](W·Bright)在《社会语言学》中提出了“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理论,指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词语的变化折射着社会发展的足迹,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伴随着每一次历史与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汉英新词语。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新词

语来探究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了解人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以及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及其价值观。从价值观的角度对汉英新词进行对比研究,就是对语言经验性的深入探讨。语言表达形式能够很好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价值观,而且语言表达形式也受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三、中西价值观差异在汉英新词语中的映射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发展折射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变迁与进步。在每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社会思想生活变革及文化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会涌现出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从而也会带来语言的巨大变迁,产生大量新词语,这些新词语在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内反映了当时经济社会的特征。

(一) 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中西价值观对汉英新词语的影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众所周知,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词语敏感而又鲜明地反映着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就中国文化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思想趋于封闭和保守,与之相适应的是“皇帝”、“奴婢”、“三纲五常”等历史词语,它们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礼制严明的特点。二十世纪初期,我国的价值观念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之一就是建立何种性质的国家,于是,涌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等新词语。五四运动以后,白话逐步取代了文言文,并日益发展和丰富。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方兴未艾,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此时期产生了表达社会主义思想和反映革命斗争实践的一些新词语,如“考验”、“整风”等。建国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新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推进了新词语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大跃进”、“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词语。在“文化大革命”中,“唯灵论”和“唯心论”是当时精神至上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表达,“造反派”、“红卫兵”、“牛鬼蛇神”等词语烙印文革十年的印记。当代政治生活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涉及社会新政治内容的词语

大量出现,“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彰显了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英美国较早进入了现代文明,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一直占着世界霸首地位,词典里最早出现 freedom(自由), equality(平等), democracy(民主), human rights(人权), legal right(法权)等词语。由此,词语“宪法”、“分权”、“制衡”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词汇。《独立宣言》带给全世界人民“独立、平等、自由、生命、人民、权利、幸福、义务”等新观念。Girlcott(女子抵制), Black power(黑人权利), sit-in(静坐)等词语无不深深地反映了美利坚民族追求平等自由的民族特性。The 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 The 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 Solo(索洛族)等词语,字里行间透露出人们要求平等、追求自由的呼声。

二战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不断变化和飞速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新景象。因此,英语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词。由于苏联、美国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形成了诸如 arm-race(军备竞赛), Warsaw Pact(华沙条约组织)等新词。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也产生了许多新词,像 sit-in(静坐), be-in(颓废派的社交集会)。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产生了大量的新词语,如: Mearthicism(麦卡锡主义), Fascism(法西斯主义), Conservatism(保守主义)等。这些新词语反映了是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当时时局变化的最佳注脚。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海湾战争、阿以冲突等世界各种局势的变化,语言界也出现了很多英语新词汇,如: 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 summit talk without ties(为拉帮结伙而举行的不打领带的最高级会晤)等词语。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带来了 terrorism(恐怖主义), Chechen(车臣武装)等词语。的确,中西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新词语是该时期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价值观的最好写照。

(二) 不同经济、科技及文化条件下中西价值观对汉英新词语的影响

众所周知,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但有一些语言符号会引起人们各种联想,表达出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语言是对现实现象的反映,词语总是随着客观事物现象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心态的多样化造就

了新词语多姿多彩的语义风格。

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领域用语不断增加,出现经济领域词语扩大化、经济行业术语通俗化的现象。“三中全会”、“中国梦”、“自贸区”展现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在我国,许多原来属于其它行业的术语或日常用语被借用到经济领域,原来的词语产生了新义,如“割肉”、“滑坡”、“坚挺”、“套牢”。“策划”、“集团”两词语原本属于中性词范畴,在解放初期具有较重的政治色彩。“策”与“煽风点火”是同义,是搞“阴谋诡计”、“煽动造反”的意思。“集团”同义于“反革命团伙”,两者都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但是,现在这两个词语变成了经济行业的术语,“集团公司”成为现代企业的通名,现代企业都注重企业的“营销策划”。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也会对相应的词语使用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如“土地”一词,解放前由于土地属私人所有,因此有“地主”、“地租”之类的词语;1949年以来,土地属国家所有,不能出售或出租,于是“地主”、“地租”就退出了使用舞台。改革开放后,土地被看作是国家拥有的一种资源,人们对土地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于是“地价”、“地租”等词语又回到了语言的使用中来。

法国著名生理学家贝尔纳指出“语言是洞察人类心智最好的窗口”^[15]。从一种语言可以窥探到它所属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伦理观念。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及中西文化价值观激烈冲突的新时期,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中国大妈”、“土豪”在海外媒体成为了热点与焦点,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状况。“十面霾伏”、“单独二胎”反映了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念日益开放,在婚恋上表现尤为突出。如“未婚母亲”、“少女妈妈”等词语,“同居”被称为“试婚”或“爱情磨合期”,“情夫”、“情妇”现改用“第三者”,把卖淫女称“第三产业者”或“小姐”,这些词语都是对我国传统伦理的颠覆。如今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着高学历、高收入、独立自主、优秀且自信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剩女”或“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或“3S女人”(Single, Seventies, Stuck),这些称谓的生动写照使我们无法体会到“怨女”、“老处女”、“衰女”的那种戏谑与嘲讽,呈现给我们的是

一种时尚、个性和自由的崭新风貌。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现代社会人们对事物不再以“两极化”或“二元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树立了多元价值观,反映出社会民主宽容、道德更新的心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外来文化凭借其科技、经济优势渗透到新词语中。科技术语和专业用语扩大化是人们追求语言科技色彩的真实写照。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到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新理论和新发明造就了许多许多的英语新词。例如:bionics(仿生学),choreography(生态地理学),gene splicing(基因剪接),band-width(带宽),这些词语形象生动,直白醒目。人类在向宇宙的进军过程中也出现了space station(太空站),spacesickness(宇航病),splashdown(溅落)等新词。通过旧词赋予新义、旧词改造等手段,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也产生了很多新词语,如:super-conductive(超导),clone(克隆),blue-tooth(蓝牙技术),flat-screen television(液晶显示超薄电视机)等词语。

新词语也是流行文化的“晴雨表”和“温度计”。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娱乐行业也产生了许多新词,如:hot line(热线),talk show(脱口秀),soap opera(肥皂剧)。体育界一些新的体育项目,需要有新的术语来表达,如surf-riding(冲浪运动),sky riding(特级跳伞)等。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有credit card(信用卡),hire purchase(分期付款)。现代生活方式涌现出vision phone(可视电话),mini(迷你装)等新词语。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日益丰富,在shopping mall(步行街)或power center/strip(购物中心)购物,在food court(美食街或餐饮区)就餐,在fitness center(健身中心)做aerobics(有氧体操)。还有专业人员从事jet-skiing(高速滑水),board sailing(风帆冲浪)等水上运动。人们去multiplex(多厅影院)欣赏event movie/event picture(电影大片)等。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它的语言^[16]。语言是时代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发展和丰富是整个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相辅相成,它是反映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

生活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一面镜子。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更是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特性。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中价值观和不同经济、科技及文化条件下价值观对汉英新词语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词语的演变中掩藏着该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辨证关系。语言中的新词语从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相应文化的思想范畴和价值观念,我们从文化中可以观察到语言体系的变迁,以及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引起的语言表达和运用上的差异。我们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揭示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克服“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增强人们跨文化交流的国际化意识和语言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 [1]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6.
- [2] 白解红, 陈忠平. 20世纪中期以来汉英新词语的来源及其语义认知机制[J]. 外国语文, 2011 (10): 21-25.
- [3] 孔筱燕, 杨廷君. 英汉网络新词构词方式对比研究[J]. 现代语文, 2014 (2): 43-44.
- [4] 蒋向勇, 邵娟萍. 从英汉新词语看语言理据观[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 (5): 31-32.
- [5] 王进. 英汉网络新词的形态理据性分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2 (4): 35-36.
- [6] Kluckhohn F. R. F. L. Strodbeck. 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M]. Oxford: Row Peterson, 1961. 12.
- [7]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63.
- [8] 苏文妙. 文化价值观与交际风格——英汉请求言语行为对比研究[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1): 27-28.
- [9] 张德明. 东西方两种灵魂的终极寻求——《西游记》和《浮士德》的母题、叙事模式与文化价值观比较[J]. 外国文学评论, 1991 (4): 34-35.
- [10] 纽马克. 功能翻译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6.
- [11] 王铁昆. 新词语的判定标准与新词语词典编辑原则[J]. 语言文字应用, 1992 (4): 46-47.
- [12] Kluckholm C. 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123.
- [13] 黄希庭. 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与教育[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 151.
- [14] 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76.
- [15]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0. 93.
- [16] 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169.

The Mapping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Word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Values

WANG Xiaofeng, LIU Yinyan, SUN Rany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Certain values, rooted in the historical soil, are the refra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ir thoughts, which restrict and affect the language. In the long-term human society, different values in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he valu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fields, formed their own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resulted in som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influences of the changes of values o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 words under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conomical and scientific conditions so a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nd west values and enhance the people's sensitivit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ast and West.

Keyword: value; new word; mapping

(责任编辑: 徐吉洪)